



INFORMATION OF STUDIES OF LOCAL SCIENCE

# 地方学研究信息

2010.4

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 主办

PUBLISHED BY CHINA JOINT CONFERENCE OF LOCAL SCIENCE RESEARCH

北京学研究所 值编

EDITED BY INSTITUTE OF BEIJING STUDY

# “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

——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学研究所人员与加拿大文化研究中心人员合影（周新民 摄）



国际会议会场（王奉慧 摄）

# 地方学研究信息

INFORMATION OF STUDIES OF LOCAL SCIENCE

2010. 4



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  
《地方学研究信息》编辑部

值编单位：北京学研究所

主编：张宝秀

副主编：孟 斌 李 洵

责任编辑：成志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7号

邮编：100101

电话：010 64909373

传真：010 64900109

网址：<http://www.bjstudy.com.cn/>

电子信箱：[ldbix@163.com](mailto:ldbix@163.com)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15日

2010年第4期

(总第21期)

内部交流 请勿转载

## 目 录

### 地方学研究

- 张 勃 世界城市建设与北京学的发展·····2  
胡晓慧 温州城市形象建设刍议·····8

### 地方文化

- 张妙弟 加强地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态度层面——以永定河  
文化研究为例·····14  
张志业 浪漫主义语境下的人文北京·····19

### 学术信息

- 庆祝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论坛隆重举行·····27  
《鄂尔多斯学研究》增刊月内面世·····29

### 学会工作

- “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隆重召开·····30  
2010年安徽省徽学学会学术年会在歙县召开·····32

# 世界城市建设与北京学的发展<sup>1</sup>

张 勃

**摘要** 北京学是一门有着经世致用取向的综合性学科，其发生与我国素有关注地方尤其是首都的学术传统以及当今时代氛围中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的勃兴密切相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航程的开启对于北京学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它为北京学研究者提出了若干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激发人们研究北京的兴趣和热情，有助于形成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当前，北京学学者应该抓住机遇，在服务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一事业的同时谋求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 北京 世界城市建设 北京学

## 一、为什么有北京学？

1994年9月16日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北京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平原率先使用了“北

京学”一词，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话题：作为千年古都和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北京和北京学都是绝好的研究题目。<sup>2</sup>目前有关北京学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多将“北京学”一词的由来追溯至此。<sup>3</sup>不过，这篇文章被陈平原自己称作是“打了引号”的“一时心血来潮”之作<sup>4</sup>。

在北京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1998年6月30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的成立。该所是北京市批准成立的专门研究北京学的一个实体性机构。在原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妙弟撰写的《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以及该所现任所长张宝秀撰写的《北京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两文中，都谈到其创建是受到了韩国汉城市立大学设有汉城学研究所的启

**作者简介** 张勃：女，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sup>1</sup>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妙弟教授和张宝秀教授均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特此致谢。

<sup>2</sup> 陈平原：《“北京学”》，《北京日报》1994年9月16日，第五版。

<sup>3</sup> 参见苑焯乔：《北京学理论体系构建初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2页。张宝秀在《北京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与展望》一文中梳理北京学的由来时，提到英若诚在1991年10月北京历史地理民俗学会年会上曾说过“北京应有自己的‘北京学’”，但在该文摘要中，她仍然将“北京学”概念的首次提出定在1994年。参见张宝秀：《北京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与展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9页。

<sup>4</sup> 陈平原：《为什么是北京——“五方杂处”说北京之一》，《北京观察》2004年第1期，第58页。

发，并获得了“在市人大、市政协、市教委工作的几位教育界老领导”<sup>5</sup>的大力支持。

北京学之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简单地说，这与我国素有关心地方尤其是首都的学术传统以及当今时代氛围中地方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我国素有关心地方、记述地方、研究地方的传统。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有职方氏之设，“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sup>6</sup>而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sup>7</sup>自《尚书·禹贡》以及《山海经》按地域记述各方之地理、物产、贡赋、风土人情等开始，我国历史上因为对地方关注而形成的地理书不胜枚举，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北京作为数朝帝都，对它的记录与研究比一般地方就更为多出。尤其元朝以降，有关北京的文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相当之高。据王灿灿先生研究，清代以前的北京古籍有151种之多，它们基本上是官府组织编写的北京及京畿地方的历史、方志和各朝文人墨客留

下的各类散文笔记等。<sup>8</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再次被定为国家首都，对北京的观察、记录与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并获得了更快发展，一方面，多种新编地方志得到修纂；另一方面，诸如《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侯仁之）、《北京历史人口地理》（韩光辉著）、《北京：城与人》（赵园著）、《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朱祖希著）、《北京：城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先后出版，呈现了多学科对北京研究的共同关注。北京学的提出，可谓这一学术脉络的延伸和发展。当然，这一延伸和发展又与地方学近年来的蓬勃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地方学的蔚然兴起已成为学术界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据潘洁在2008年的“初步统计”，“地方学研究会、所、基地、中心已达23家”，<sup>9</sup>迄今为止，已经提出专名的地方学已有敦煌学、藏学、徽学、北京学、上海学、武汉学、南京学、杭州学、西安学、青岛学、开封学、温州学、鄂尔多斯学、扬州学、泉州学、洛阳学、三峡学、吐鲁番学等，此外还有未以地方名学

<sup>5</sup> 参见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5页。张宝秀：《北京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与展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9页。

<sup>6</sup> 《周礼》，《十三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91页。

<sup>7</sup> [宋]司马光：《河南志序》，[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8</sup> 王灿灿：《燕都古籍考》，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sup>9</sup> 潘洁：《地方学的定位及其社会历史功能》，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地方文化与地方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选编》，2008年11月，第59页。

但也颇有影响的地方文化研究，如齐鲁文化研究、三秦文化研究、晋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国际上，巴黎学、伦敦学、罗马学、东京学、大阪学、横滨学、汉城学亦纷纷兴起。如果将近年来地方学的兴盛视为一种潮流，北京学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支脉，而其提出，显然也受到先其而存在的其他地方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的成立直接受到汉城学的启发，陈平原之提出“北京学”，也受到上海学者关注上海的明显刺激。

如果对我国已有的各种名目的地方学进行一番检讨，可以发现敦煌学与徽学在其中较为特殊。它们虽然同样以地名学，但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主要在于当地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这也决定了敦煌学和徽学的贡献主要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比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栾成显就曾对徽学做出如下界定：

徽学是以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徽州文物遗存为基本资料，以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进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sup>10</sup>

由此可见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而包括北京学在内的其他多种地方学，则有

着与敦煌学和徽学颇为不同的兴起路径，它们更多是地方学者在全球化时代氛围中立足地方，主动谋求以学术服务地方、参与当地经济发展、文化建设而积极努力、自觉“构建”的结果，它们也提倡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但有着更加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往往将应用性作为研究的重要属性。北京学也不例外。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将“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作为办所宗旨，而以其为基础、吸收国内外一批学者于2004年组建而成的、唯一专门从事北京学研究的北京学研究基地（是主要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筹建的首批18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更将工作方针定为：“关注北京发展、研究焦点问题、提供可行建议、完善学科体系。研究基地在努力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当好参谋的同时，积极为北京市相关企事业单位提供策划咨询服务，积极开展面向广大市民的科普宣传活动。”<sup>11</sup>研究机构的这种定位实际上反映了北京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北京学是“资治”、“辅政”之学。<sup>12</sup>这一定位，令已有其名但尚待完善的北京学与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政府工作目标自然地联系起来。

## 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航程的开启及其对北京学的影响

<sup>10</sup> 栾成显：《徽学的界定与构建》，《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7期，第34页。

<sup>11</sup> 参见网址<http://www.buu.edu.cn/home/bjx/gaimao.html>。

<sup>12</sup> 马万昌：《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9-20页。

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新近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在已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明确了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目标”，并将这一目标的达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阶段是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是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市委书记刘淇作工作报告号召，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在稍后（2010年1月）召开的北京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郭金龙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首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从而正式开启了向世界城市目标驶进的航程。

这一航程的开启，对于北京城市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将大大促进北京学的发展，这是因为：

首先，它提出了若干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北京学研究者参与解答，或者换句话说，它为北京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如下一些：

1. 什么是世界城市？

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未来发展的目标，

什么是世界城市便成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2. 北京应该建设成为怎样的世界城市？

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主要有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但同为世界城市，却有着各自的特色，那么北京要建设成为怎样的世界城市？

3. 北京距离世界城市有多远？

4.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是什么？

5.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可以利用的目前已有的资源有哪些？怎样使用它们以服务于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

6.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应该开发应用哪些新的资源？又如何开发应用？

这些问题都直接联系到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这一政策的实践领域。如果我们承认北京学应是以北京区位与环境、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综合体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是北京学的宗旨，那么北京学研究就应该努力解答这些问题。一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要要求学者采用开放的眼光，认真地研究北京的过去和现在，研究北京之所以有这样的过去和现在的发展逻辑和发展动因，必须将北京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找寻自己的差距和独特之处，而所有这些，都是北京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本身就意味着北京学研究的拓展和加强。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解答，

可以备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咨询，提升北京学经世致用的能力，并进而提升其学科地位。学术发展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学术的发展不可能离开政治环境，政府支持往往是一种学术成为显学的关键因素。如果北京学能够在资治辅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则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

其次，这一进程的开启激发了人们研究北京的兴趣和热情，并为兴趣和热情的抒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其典型表现就是世界城市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纷纷发表，以世界城市建设为主题的会议陆续召开，迄今为止，仅笔者知道的就有2010年3月1日召开的“世界城市建设国际论坛”，（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3月20日召开的“智慧·奉献·共享——首都女教授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论坛，4月27日举办的“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研讨会”，5月20日举办的，“世界城市建设外国专家座谈会”，6月2日召开的“世界城市：北京发展新目标”论坛、“北京市青联人文、科技、绿色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系列研讨会”，7月18日召开的“2010北京文化论坛——建设世界城市提升首都软实力”论坛，9月18日召开的“北京首届世界城市全球论坛”以及10月23日开的这次“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诸多与世界城市建设有关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具有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的开设，

表现出对不同领域对研究北京的浓厚兴趣。研究平台的扩大对于北京学的发展至少会产生两方面显而易见的影响。一方面，它优化了北京学研究的社会氛围和学术氛围，使人们对于北京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以北京学研究者自居的学者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这些会议和论坛，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有更多机会提高北京学在多种场合的可见度，扩大人们对北京学的认知度。另一方面，每次会议、论坛的召开都会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它们往往体现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学者的最新思考，而且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这些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呈现，有助于以综合性为学科性质定位的北京学对它们的汲取、总结和抽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京学的学科体系。

再次，这一进程的开启有助于北京学形成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如果说北京学自其提出之后更多以地方学的视野来看待自身，那么世界城市建设进程的开启，将引导北京学研究者以更加开阔和整合的视野来看待北京学和北京学研究。尽管目前关于什么世界城市有多种观点，但却公认世界城市的建设绝不是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取得成就即可以成功的，它是一个城市诸多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推进，它需要宏观、长远、整体的眼光，这就要求北京学不能是对北京这个地域范围内的种种事象进行研究的简单迭加，它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能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北京发展的因果关系和诸多要素的



内在关联性。它要求北京学研究的北京，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研究者求搜罗资料之便而划定的地域四至，它是一个城市共同体，是那些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在北京这个特定区域空间内社会行动者、制度、国家等诸多要素聚合而成的、使社会得以行进或发生改变的条件或机制。它要求北京学研究不仅是内视的，还要是外观的，不仅要与国内的其他城市相比较，而且将北京与中国之外的其他城市，尤其是已经被公认为世界城市的城市相比较。

### 三、北京学：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谋发展

自1994年“北京学”首次提出以来，迄今已有16年的时间，这期间，北京学获得了较快发展，张妙弟先生曾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为例回顾了2008年以前北京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认为“经过7年初创和3年的建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sup>13</sup>大致而言，北京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专门研究机构在体制内得以确立；出现专职研究人员，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将自我定位为北京学研究者；学术会议实现制度化；一大批学术成果出现，尤其是关于北京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不断发展；国内、国际交流日益增多；承担各个层级的课题项目以及参与北京城市建设、文化建设的能力在持续增强；等等。尽管如此，北京学

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要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学科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当前，尽管对北京应不应建设世界城市、能不能建设成为世界城市，一些人还心怀疑虑，甚至进行强烈质疑，但毫无疑问的是，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已成政策现实，而且这一政策现实正在热切地呼唤学术界用整合的眼光加强和深化对北京的研究。如果说，地方学的兴起刺激了北京学的产生，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政策现实则为北京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北京学应该抓住时代和社会赐予的这个难得的契机，厘清建设世界城市对北京学研究的要求，并在广泛协作的基础上组织力量进行学术攻关，用建立在科学精神和方法基础上研究出来的成果服务于建设世界城市的政策目标。北京学研究群体如果将自己知识生产的定位于对这项工作的学术自觉，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壮大研究力量，培育学科体系，推进基础理论建设，就有机会在服务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成就自身的事业。有理由相信，作为北京学研究者，我们越努力，我们的前景就越乐观。

<sup>13</sup> 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5-78页。

# 温州城市形象建设刍议

胡晓慧

**摘要** 区域发展竞争，基本上是城市之间的竞争。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竞争转向包括城市形象在内的复合竞争。城市形象、城市文化这一软实力已日益引人注目。温州的发展正进入新一轮地域竞争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温州提升整体形象的重要时期。本文着眼温州城市形象建设滞后于温州经济发展，与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的定位不相称的现状，就城市形象这一无形资产的挖掘、整合、培育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关键词** 城市形象 文化 品牌

## 一、问题的提出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这令人难以忘却的“城市的面貌”就是可被感知的城市形象，就是“活生生存在于城市空间和时间中的生命的热度、岁月的痕迹、文化的积淀”<sup>1</sup>。

城市不仅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发源地，它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亚里士多德说：“城市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大容器”，“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sup>2</sup>。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应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家”，一个好城市能够成为人类“灵魂的家园”。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内在精神底蕴和外在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城市建设中硬件和软件的结合，是城市发展的战略资源。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竞争转向包括地域文化、城市形象在内的复合竞争。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地域文化与城市形象甚至是决定城市竞争胜败的第一要素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引领与支撑。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塑造良好的现代城市形象既是时代

---

**作者简介** 胡晓慧（1968-）：女，《温州学刊》执行编辑，副研究员，浙江省温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方向：区域史、民俗学。

<sup>1</sup> 鲍宗豪：《城市精神文化论》，载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第18页。

<sup>2</sup> 王雅林，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发展的要求，也是温州发展的现实所需。温州，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抢眼的城市之一，写满精彩悬念和现代传奇。800多万温州人，凭着“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他们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走出了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温州的城市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州作为一个不断开拓创新，狂飙突进，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并领跑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兴城市，在国内外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今天的温州，不仅仅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地理名词，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观照<sup>3</sup>。但与上海、大连和青岛等城市相比，温州在城市形象建设方面的认知程度、重视程度、建设力度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温州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节点城市，是浙南闽东的区域核心城市。浙江省2008-2020年的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以及金华-义乌都市区，温州是全省四个大都市区之一。所以，现在的温州发展，正进入新一轮区域竞争、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整体形象的重要时期，在这重要的发展关口，提出加快城市形象建设，对城市形象这一无形资产加以挖掘、培育、开发和利

用，来推进温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城市形象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软实力的概念是由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提出，以美国为背景的。他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目的在于消除整体实力中软、硬实力不对称对美国造成的危害。“软实力”也有人译为“软权力”，它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sup>4</sup>。它主要是指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因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以城市形象属城市软实力的范畴。经济、军事属硬实力，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此届温州市委和市府已明确指出：文化不仅是软实力，更应是硬实力，要让文化为温州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以温州文化为内核与底蕴，把温州这个“全民创业”的“民营之都”转塑成“创新之城”，把温州打造成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宜居、宜商、宜创业、活力四射的生态型、国际性、现代化的温州城市新形象，意义十分重大。

良好的城市形象将会促进温州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朝阳产业。世界旅游组织理事会秘书长李普曼认为城市形象将决定旅游业的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城市文化不仅可以给旅游者留下亲切、

<sup>3</sup> 胡方松，方韶毅，刘旭道：《温州评判》，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5月第1版，第25页。

<sup>4</sup> 李海娟：《“软权力”竞争背景下的文化战略》，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2期，第49页。

美好的印象，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城市文化、地域文化的象征物本身就是最好的旅游资源。比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丹麦的美人鱼、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等都给当地旅游业直接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任何一个试图发展旅游业的城市，都不能不重视城市形象建设。温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既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另加快旅游业发展，也是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所以温州不能不重视城市形象建设。

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助于人才的聚集和“选商引资”。现代人才学认为，一个城市或组织获得人才的能力，决定于其人才激励体系的水平。这个激励体系由“双因素”激励理论发展而来，由低向高依次分为金钱激励、体制与用人激励、发展与成长激励、价值观与文化理念激励四个层次，其效用依次递增。也就是说，层次越高的人才，文化的激励作用越大，对文化的追求是人最终的追求目标。一个城市如果有高雅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氛围，一定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一个城市如果只有低俗的文化，也只能吸引低级的人才。另外，城市形象和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环境，城市形象的优劣会直接影响投资商对这个城市的投资热情。人才制约是温州发展之痛，“选商引资”是市委确定的“一号工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温州都必须重视城市形象建设，精心打造好自己的城市品牌。

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品位的提升。城市形象塑造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的精神文明程度，从而提升城市的品位。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城市形象建设这个新的载体，弘扬传统地域文化，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创新城市现代文化，从而推进城市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尤其要通过城市形象建设这个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和媒介，有效地引导市民更新观念，规范行为，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有效地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激起他们对温州城市的挚爱之情，使广大的市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以精神文明的成就推动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升温州城市的品位，激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利于增强温州城市的美誉度。现在，温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比较高，但是美誉度并不高。温州给外人的印象往往是经济发达、商业气息浓，人文精神稀薄，虽然很有活力却不上档次。温州要改变这种形象，必须要有更高的眼界、更宽的胸襟、更大的视野，谋划好自身的发展，一定要统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形象建设。因为对一个城市来讲，经济活动是她生命力的主要内容，形象是她生命力的外在表现，文化是她生命力的营养和动力源，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今天，温州应该更加重视文化发展和城市形象建设。因为，城市之魂，文以化之；城市之形，文以铸之，挖掘丰富的传统瓯文化资

源，融入现代先进文化要素，提炼、打造成既传承历史文脉、又与时俱进的温州精神、温州理念和温州形象，从而全面提升温州的美誉度。

总之，城市形象的优劣，直接影响人们对城市的认同和评价，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和重要源泉。我们应该把城市形象建设作为一个战略性课题，摆在温州长远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 三、城市形象必须体现温州独特的文化个性

城市形象的建设目的是提升城市的整体品质，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但城市形象的内核与底蕴要借助文化来体现，它的构建离不开历史文化之“源”和现实文化之“流”。文化内涵不足的城市，其繁荣往往逃离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文化是城市的记忆，城市的外观只是形，文化形象才是魂，只有形魂一体的城市才能生生不息。比如，如果没有音乐，维也纳是什么？没有卢浮宫自由而又浪漫的艺术气息，巴黎算什么？没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南又怎能叫人永忆？没有“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扬州又怎能如此妩媚，令人惦记？没有“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温州又怎能告别“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贷款吃饭”贫穷落后的昨天？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言：“21世纪，成功的城市是文化的城市”。事实证明，

凡是伟大的城市、有魅力的城市，它可以不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但一定是文化中心。搞好城市形象建设，关键是要找准城市文化的“根”，找到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特色。

从资源角度看，温州是一座文化个性特色鲜明的城市。比如，在自然条件方面，温州兼得山、海、江、湖之利，是一个风景十分秀丽且丰富多样的城市。温州城市依山傍水，临江面海，市区有九座山，山在城中，城在山中，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山、江、海相交融，是一个典型的山水海滨城市。国家级风景区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省级风景区7个，市级风景区8个，不仅山清水秀，而且丰富多彩。既有雁山云影，又有瓯海潮踪，而梨花荡漾的永嘉古村落、古朴矫健的泰顺廊桥、蓝天碧水的南麂海滩等景点，宛如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温州各处。旅游景区面积占了全市国土面积的22%，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在历史人文方面，瓯越草根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内涵非常丰富，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反差。温州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其人文色彩、地域文化由于历史传承，与别的城市比，独具个性。可以说，善于创新历来是温州城市、温州文化的灵魂。在古代，温州之所以能够崛起于农耕经济的深厚土壤，成就斐然，原因就在于温州先民比其他地区的先民具有更加强烈的开拓创新品质。《宋本方輿胜览》记载言：“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备用”。这段话证明这里的人民吃苦耐劳、善于适应、善于创新的

特点。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事功学说，与当世大儒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分庭抗礼，三足鼎立，更体现了温州先民不迷信权威，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南宋“永嘉四灵”诗派反对江西诗派“要求字字有来历”的主张，提倡诗歌的个性和创新，与永嘉学派遥相呼应。此外，温州还是南戏的故乡，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这些都展现了温州的文化底蕴，闪耀着历代温州人民创新精神的光芒。

在经济发展方面，温州经济格局独特，商气浓郁，活力四射，温州模式不仅闻名天下，而且还是一个微观体制创新的典范。温州领跑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出了数十个“全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等等。还有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江”的。在改革大潮中，有220多万的温州人在海内外创业。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走出温州的温州人中的170多万，不仅创业的足迹遍及全国，而且还建立了一百九十多个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异地“温州商会”，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创举。正如《温州评判》一书的作者们说的：“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篇神话，她是在最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她是在最难走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温州，温州人，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卡尔文森所言：“这里是我所见过全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这里有全中国最具活力的人”。

还有温州人的语言自成一系，精神面貌自

有传承，族群特征相当明显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塑造温州城市形象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雷同化、一般化大趋势的影响，现在温州的城市形象并不鲜明，城市的风格和特色不突出。

打造个性鲜明的城市形象，必须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人文渊源和现实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整合优势资源，在空间范围和时间历程上做出科学判断，进行准确定位和精心策划。就温州来讲，特别要在把握好山海风景特色、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展现其极其富有现代感的活力之都、魅力之都的新形象。在具体操作上，应着重遵循以下四条原则：一是系统性、独特性、前瞻性与现实相一致的原则；二是历史、现状和未来相衔接的原则，既要根据温州城市所在地域的民族、历史、文化、环境特点，塑造具有温州特色的城市形象，又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融入温州城市的时代精神，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温州城市形象；三是环境、功能、理念相统一的原则，特别要充分考虑温州人与温州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使温州人与温州的自然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四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必须充分考虑和满足居住于斯、生息于斯、创业奋斗于斯的温州人的最本质的需求及他们需求的持续提升，做到温州政府的意愿和温州市民公众的要求相融合，使温州人能在这方水土上“诗意的栖居”。

#### 四、城市形象建设的几点建议

城市形象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全民动员，统一

组织实施。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和做法，本人建议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件事：

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形象建设。近阶段来，其它很多城市对实施“城市形象工程”非常重视，都有专门的领导机构来抓。温州市也应该成立形象建设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党政一把手要经常亲自研究城市形象建设问题，真正把城市形象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各项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去，做到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推进。

要形成齐抓共建的建设局面。城市形象建设是事关全局的一项综合工程，党委要高度重视，政府要牵头，部门的责任更要落实。要在统一部署的前提下，建立分工落实的责任制监督机制，使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各个职能部门，切实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保证各项工作和项目的落实，务求使温州城市形象一年比一年好，年年都有新进展。同时，还要注重长效机制建设，保证这项工作能经常化、制度化地进行。

实施城市品牌化战略。正如世界营销之父科特勒所言：城市已进入营销时代。建设温州城市形象必须以营销的理念实施城市品牌化战略。必须借助于如电视、报纸等有一定覆盖面的颇具影响的新闻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经常性地举办一些高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温州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持续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等；

举办一些节庆活动，开展城市公关。如温州的轻博会、农博会、摄影节、瓯菜美食文化节、友好城市等。利用自己城市独特的节庆活动提高温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塑造温州与众不同的城市形象。

强化市民对城市形象建设的参与意识，努力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城市形象是城市社会群体人文素养的反映，是城市民众集体的价值共识、审美追求和信仰操守的体现。创造温州城市形象的过程，也就是温州人现代化的过程，即温州人的素质和温州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现代化。有学者言：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正如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一个城市的前途也一样。因此，温州城市要搞好城市形象的建设，不仅要强化温州市民城市形象建设的参与意识，广泛动员市民群众积极关心、热情参与城市形象的建设。而且要全面提高市民素质，以良好的市民形象丰满城市形象。

加强政府建设力度，树立服务型政府新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形象就是城市的形象。高效、廉洁、规范的政府服务与合作是一个城市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部门管理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和质量，树立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良好形象。

# 加强地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态度层面 ——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

张妙弟

近些年来，国内各地地方文化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人们在下力量发掘整理各地的地方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关注到地方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大潮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本文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强调加强地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态度层面。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

永定河文化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母体文化的重要地位，是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永定河文化研究已经有了不少进展和积累。其中门头沟区首先明确提出将打造永定河文化品牌，作为促进门头沟区发展的重要措施，永定河文化研究、古村落研究、京西古道研究，多个方面逐步深入，成果迭出。市社科院尹钧科、吴文涛两位学者则捧出了他们钻研多年的系统性认识《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一书，该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堪称永定河文化研究的标志。它不仅深刻阐明了历史上的永定河及其与北京的关系，还首次提出了永定河文化的十大内涵。还有一批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围绕永定河文化这个主题

作了大量工作。

本文想强调的是，在以上工作和成果的基础之上，永定河文化研究需要加强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态度层面。为叙述方便，本文以门头沟区的实际情况为主进行分析，也会涉及永定河流域内的其它地方。

根据尹钧科、吴文涛的定义，“何谓永定河文化？永定河文化是对在永定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中，人类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世代所创造的区域历史和区域文化的总称”[1]，并指出它涵盖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笔者认为，这里所讲的两个方面中的自然，主要不是指自然本身，而是指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产生的认识，产生的感情，产生的相处之道，产生的后果，也就是产生的文化。这些认识、感情、相处之道及后果，还会随时间而变化，也就是它也会形成自己的历史。以山水文化为例。在永定河流域，人们怎样利用永定河干流与支流的水，为自己造福谋利，又怎样同永定河的洪水或者地区的干旱做斗争，以减灾避患，这就是永定河流域水文化的主要内涵。而名山文化则是指与名山相关的名人、事

---

**作者简介** 张妙弟：男，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顾问、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地理学、北京学。



件、文物、古迹、诗词、文章、民俗、特产等为内容的文化。实际上，名山本无所谓“名山”，只有在人对它有所认识、欣赏、宣传、利用之后才会“出名”。说这些，只为一个目的，即想强调，在讨论永定河文化（讨论其它地方文化也一样）的语境下，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都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资源，都是人作用的对象，作用的结果是产生文化，其过程则形成历史。所以，我们目前所从事的研究对象的核心是“文化”。我想，这大概也是大家同意将我们的这个研究对象用“永定河文化”这个名称来表述的原因。

永定河文化具有几个最基本的性质，即区域性、乡土性、遗产性。

区域性，即地方性，指以永定河流域为范围的区域性。这个性质，不必多讨论，只指出一点，门头沟区的永定河文化研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整个永定河流域内，永定河穿越“百里山峡”这个自然属性以及地近京城这个地理区位，带来了它的文化的特殊性。所以讨论门头沟区的永定河文化，不仅仅在于一个行政区划单元的意义，更主要在于一个文化地理单元的意义。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趋明显。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永定河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向。与其它区域相比较，它有自己的个性，当然也有共性。

乡土性，也就是民间性、草根性，是相对于宫廷、官府、文人的文化而言的文化特性。由于永定河流域中包含有北京、大同、涿鹿三座古都，尤其是北京城作为都城影响尤为深远，永定河文化中含有一定数量和级别的宫廷

文化、官府文化和文人文化。以门头沟区现存古迹为例，有金代皇家游览胜地仰山，明刘定之《重修仰山栖隐寺碑记》云：“……(寺)创始于金时。金之诸主，屡尝临幸，有金章宗所提诗在焉”；有金太宗完颜旻第八子完颜窝鲁欢之墓、清初靖南王府耿聚忠既柔嘉公主合葬墓、清太宗皇太极四世孙显亲王丹臻墓、慈禧太后之父承恩公惠征之墓等历代王室宗亲墓；有民国初期来京为退位的宣统帝教授英文的苏格兰人庄士敦的别墅；有与朝廷关系十分密切的寺庙潭柘寺和戒台寺等 [2]。尽管如此，永定河流域广大区域地处山区、农村、其世代传承的地域文化更具有强烈的乡土性。门头沟区的古村落、古民居、古道无一不是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中发生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妙峰山的庙会被视为华北民俗文化的圣地，其兴盛尽管与乾隆皇帝封妙峰山娘娘庙为金顶有关，但是其核心内容是民间信仰和民间花会。流传至今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千军台、庄户村的古幡会、古幡乐和大峪村的太平鼓都源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娱乐于民间。再举一个典型案例——蔚县上苏庄村拜灯山 [3]。蔚县地处永定河右岸最大的支流壶流河流域，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上苏庄村是建于明嘉靖年间至今已有45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堡，拜灯山是其代代相传的民俗社火活动，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核心内容是敬祀火神。拜灯山的过程包括点灯山、拜灯山、耍社火、唱大戏四个部分，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举行时，人们按照传统方式，酬神娱人，处处充斥着乡土气息。

遗产性，笔者将其概括为三层含义。第一，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趋于衰微甚至消亡。举例来讲，门头沟区的煤业文化，自辽代采煤开始，到清末进入近现代采煤业阶段以至到现今，采煤业在门头沟区全面停止，其相应的文化随之不断变化。其中的生产组织形式、窑神崇拜以及约定俗成的某些习俗失去依托而趋于消亡。现代交通的产生使得原来运煤古道上的“蹄窝”不可能继续发生和发展而只能成为历史的遗迹。这种变化，可以认为是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变了，文化本身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第二，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改变，原有文化中的一部分发生了功能的转变，由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功能转换成现代意义上的功能，或者处于这种转换的过渡状态。例如今天妙峰山的庙会固然有很多的传统文​​化要素包含其中，也不可否认，今天参加活动的民众与一百年前民众的想法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今天这个庙会既有传统内涵丰富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的性质，又是适应现代人追求自然与人文双重享受的文化节庆。也就是说，它的文化功能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第三，包括前两层意义在内，所有的文化现象都会随时间进程而变化。一般来说，时间距离越大，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的变化就越大，遗存至今的文化的稀缺性就越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遗产性。以古村落为例，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指出：“最大文化遗产是古村落”，而“如今它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愈来愈多的村落因农民外出打工而出

现空巢现象。有的古村落经年历久，多已破败，重修无力……”门头沟的爨底下、灵水村、琉璃渠，之所以能够位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之中，不仅是因为它们有着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还因为它们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如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如发生战争、重大政治变故或重大自然灾害），原来文化会遭受更集中、更严重的破坏，文化的历史遗存就会更加稀缺。永定河文化十大方面中的相当部分具有这种遗产性。

以上是永定河文化三个最基本的性质。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分析在当今形势下，永定河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人们采取的文化态度。

毋庸讳言，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左倾”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其影响是严重的。永定河文化也在其中。好在人们经过总结和反思，已经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遗产日的设置，一系列文件和法规、规划的制订，国家和地方文化遗产名录的整理，一系列保护、发展措施的推行以及多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出台，加上学界的推动，中国在传统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新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在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概括地说，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国内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农村为例，引发农村生产、生活

方式的巨大变化，造成大量年轻人进城或者进企业而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普及以及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化等，都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可以认为，“文革”的“阵痛”已经过去，消除其后遗症影响还需一定努力，而当前更主要的负面影响则源于上述两股力量。这是包括永定河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所面临的局面。

再说得具体一点，永定河文化也与其它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面临着保护与开发这一对两难的矛盾。这一对矛盾，一头连着传统文化的保护，这个保护由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而愈显突出和重要；一头连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由于现代化与城市化目标的指引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鼓励而具有了充足的动力。问题是，保护有保护的原则，开发有开发的目的，两者从目标到实践，均存在明显的悖论。

拿开发这一头来说，近些年来地方对于开发本地的传统文化，可能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是弘扬地方文化，这是最好的一种。其目标是发掘地方文化，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动力和特色。尽管这种做法之中也有着谋取商业利益的因素，但是毕竟弘扬地方文化是一件好事，只要在开发中保持文化的主体地位并能避免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就行。二是急功近利打着文化的旗号为地方经济招商引资。这一种是前些年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标志性口号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文化作为配角，不仅仅要立竿见

影地服务于招商引资这个主角，而且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人们还会根据需要随意改动甚至制造假的文化遗产。三是纯粹的商业利益推动，这是最不好的一种，它往往由商业利益集团操作，对文化的随意性更大，破坏性也更大。这一种不是开发地方文化，而是糟蹋地方文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几个地方“争”同一个文化遗产，如卧龙岗之争、杜康酒之争、梁祝之争以及近来的赵子龙故乡之争等。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弄清史实是好事，发扬地方文化也是好事，如果出示上述第二、三种目的，就不好了。

再看保护这一头。近些年来，各地对地方文化的保护是有较大力度和取得重大进步的。主要的问题有几个。第一，哪些一定要保，哪些保不了，哪些可以不保，从理论和政策上并没有完全明晰，造成实践中的困难。第二，保护工作的速度和力度赶不上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第三，保护的方式和途径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积累经验。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传承人工作，方向已经明确，而大量实际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地方文化研究概括地分为三个层面。文化资源层面、文化态度层面、文化实际工作层面。可以认为，就整体而言，在当前的地方文化研究中，有必要强调加强其中文化态度层面的工作。

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一方面如前所述，《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一书堪称永定河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它是对永定河文化资源全面、深入的发掘和系统的梳理，并确立

了永定河文化作为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母体文化地位。另一方面，以门头沟区为代表，既大力推进了发掘、整理资源的工作，如出版了一批丛书，也十分重视实际工作层面的工作，包括保护传承和开发。问题是，前述各地地方文化在保护传承和开发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永定河文化研究之中。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离不开加强其中文化态度层面的工作。

笔者认为，这里所采用的“文化态度”的说法，无论是从术语用词上，还是在学术内涵上，都还有很大的不成熟性，还需要进一步斟酌。目前只是从研究的逻辑和工作环节上认为迫切需要加强这么一个环节。它以资源层面为基础，而它又是实际工作层面的基础。只有加强它的研究，资源层面的丰富内容才有可能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而实际工作层面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才有希望逐步解决。例如，深入分析各类地方文化资源形成的社会发展背景条件以及这种社会发展背景条件在当代的变化，也就是分析清楚各类地方文化资源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这才能明确前述哪些一定要保，哪些保不了，哪些可以不保的问题。又如，对于由于时代的前进，某些文化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再存在，造成某些历史上的地方文化以“活态”形式保护不了也不必活态保护的，经过研究，需要明确对其以博物馆形式保存起来；而另一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地方文化类型则可以赋予其新的时代功能。再如，说到保护的原则，在讨论世界级文化遗产以及适当扩大的范围内，以整体性和原

真性为标准是必须的，但也必须承认，在讨论很多地方的地方文化的时候，坚持这两条是很困难的（包括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等形式在内），当地居民要求享受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是正当的，寻找既能保护、传承地方文化、又能满足当地居民正当要求的“双赢”之路是必要的，而这条道路的诞生一定是以深入研究和认识地方文化（包括历史的和当代的）为基础的。还如，对地方文化要真正处理好保护和开发这一对矛盾，继承、发扬地方文化优势，在现代化、城市化大潮中保持充足的动力和明显的特色，就一定要注重内核、提炼精华、古为今用、不断创新。

总之，本文强调的是，对地方文化，人们通过研究，梳理资源，产生认识，形成态度，推进保护、传承和开发工作。在目前的实际中，更需要加强的是处于中间环节的认识和态度这个层面（暂时将其称为文化态度层面）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尹均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0月。
- [2] 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文物局：《门头沟文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12月。
- [3] 侯秀丽：《原生态是民俗的生命，民众是民俗的灵魂——09元宵节蔚县民俗活动考察记》，《古村落》，2010年第2期。

# 浪漫主义语境下的人文北京

张志业

从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闭幕，标志中国步入后奥运时期。二零一零年的上海世博闭幕，所谓的后世博时期的帷幕即将拉开。一个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承办两件如此重大的国际大规模事件性活动，在世界上实为罕见。奥运和世博为中国留下了众多的遗产，有物质文化方面的（建筑、场馆等硬件设施），有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文化创意及其表现形态）。但是，它们究竟在公众的视野中和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什么永恒的记忆？北京奥运闭幕二年多，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珍贵的启示。

北京奥运场馆，除了一些极具代表性的永久建筑，如鸟巢，水立方等，将长时间留在人们视野中，但更多的一些建筑，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人们脑中消失，但是，绝对会有一些东西，而且是非物质的，会长久地留在人们心灵中。这就是本文所要提出的城市的浪漫主义问题。

这个题的提出，是受到今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启示。相对于倾全国之力办奥运的

中国来说，温哥华的场馆建设实在是少得可怜。但是，恰恰在冬奥期间，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每天涌向市中心。他们并不一定是去看赛程，并不一定去参观场馆设施，更多的人就是在市中心的街道走来走去，体验聚集在一起的快乐，几乎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喜悦。他们实在也没看到什么东西，而是在享受着某种气氛，在故意地向所有突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传递一种精神。很难精确地指明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绝对是一种享受，是一个无法用巨大场馆调动起来的奔放情绪，这种情绪的爆发似乎有某种意识和人文的密码。从温哥华到北京，有太多的人文的和精神的密码，但其中肯定包括有一种，就是人们积蓄已久的集体性的城市浪漫主义。这不仅仅是北京由于古老便会使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浪漫留恋，而是本文所要特别讨论的城市浪漫主义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久违了，然而，这也是城市文化发展在碰到钢筋水泥面前的一种不幸和企图解脱的福音。

---

作者简介 张志业：男，加拿大文化中国执行主编。

1 纳兰性德《木兰花·拟古绝词谏友》，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纳兰词笺注》，2003年，191页。

2 王安忆：《上海味和北京味》，收入香港三联书店编《上海人和北京人》，2001年，58页。

## 一、后钢筋水泥时代浪漫主义的出场

城市的浪漫主义问题，是后城市化过程中值得思考和期待的一个严重课题。城市浪漫主义的问题，在后奥运时期，作为人文北京的一个课题提出，是一个恰当其时的机会。

北京奥运自从启动兴建并大举施工后，直至开幕和闭幕，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样一个钢筋水泥时代里所进行的任何肩负宣示和展览意义的重大活动中，有意识地避免了钢筋水泥时代的冷冰感觉，而不断地以自然、遐想、环保、甚至原生态的形象吸引世界的关注。所以我们说，从北京奥运开始，城市的浪漫主义终于在后现代赤裸裸的钢筋水泥时代出场了。人们几乎忘记了，仅仅在几年前，或最多十几二十几年前，钢筋水泥时代的登台，全面挤压了本来就不多的城市的浪漫主义。中国在建国头三十年中城市建设基本是停滞缓慢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本来，在一个刚刚从几乎农耕社会甦醒过来的社会，对城市化的追求，全然没有任何閒情逸緻地去怀恋所谓的城市的浪漫主义，但现在却出现了。王安忆把历史北京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世界，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分都是北京城市浪漫主义的大本营。尤其奥运和后奥运期间，大片大片高楼大厦，意犹未尽地每天林立出现，虽然千城一面的建筑伴随偶而引起争议而没有任何情趣的诡异试验，继续在统治着城市人们的视野，但是，与此同时，顽固生存的城市的浪漫主义，又成为北京奥运

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本来是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但成千上万的人，却关注的是当时那全民犹如嘉年华会的喜乐。这说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浪漫主义，对于奔波和生存挣扎的当代人来说，那是一种机会难得的重新享受，是被钢筋水泥拖累得身心疲惫之际的一种大释放。

无论从北京奥运，还是上海世博会，从观众来看，这是一种短暂的释放，但对于从学术角度研究城市发展来看，这可能让我们有机会讨论如何回归到最初的城市浪漫主义问题上。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城市的浪漫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从远古的城邦到近现代的城市，但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本文之所以特别关注到这个问题，完全是在将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从而以钢筋水泥挤压人类自然本质的窘境并日益呼吸困难下，被迫产生出的一种文化和精神氛围的渴求。但实质上，城市的浪漫主义，从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从乡野走向都市后，整体构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指城市基本的硬件建设，包括建筑、交道、公共设施等，所谓「精神」，则是围绕城市建设之前或之后形成或引发的文化观念、艺术创意、生活习俗、社会风情、人际交流等精神层面的活动。当然，还不仅仅指这些，本文下面会谈到的。

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或者美学意义上的指向，浪漫主义是由欧洲在十八世纪至

十九世纪艺术创作手法、表现风格和在社会上形成的冲击特点等综合而成。这种艺术领域内的讨论，可能至今还有许多争论，但是，本文讨论所特定于「城市浪漫主义」的概念，基本上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创作方法。所谓「城市的浪漫主义」，不一定仅止于城市建筑的设计风格，都市地理特点的面貌，或者某一城市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可视觉的景观。我们所论述的「城市浪漫主义」，当然无法离开建筑风格、地理风俗、历史故事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其融洽于一个整体的都市氛围和感染力道，一个随时能够激发出人们不一定为了某种历史大事件才能有的情感冲动。这种潜在的内在的城市基因，很可能从城市一旦开始形成便会自然地「附庸风雅」于其中。

本文作者在思考「城市浪漫主义」这个话题时，注意到欧洲浪漫主义在文艺领域掀起时，浪漫主义的单词是Romanticism，而这个单词由Romance（即浪漫）而来，但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单词，其词源是由「Roma」（罗马）而来，而罗马便是欧洲最早产生的城邦和都市<sup>3</sup>。无论如何，当我们现在重新谈起浪漫主义时，也许会忽略注意到，当年罗马的城市建设，及其最古老的城邦光辉，让几近一千年后的艺术家，在创造一种新的艺术思潮和流派时，如何将其与古老的城市联在一起并得到伟大的启示。无论如何，浪漫主义天生就是同城市的兴起、建

设、发展连在一起，只是在后钢筋水泥时代逐步地淡忘了。罗马城邦有许多故事和传说，悲喜交加的爱情，生死存亡的英雄，可歌可泣的战争，从坠落到神圣，从卑鄙到高尚，从杀戮到相爱，从渺小到伟大，从痴愚到聪慧，从今生到彼世，从当下到未来，从绝望到盼望，从真实到神话，几乎所有发生在城邦里的故事，都是后世浪漫主义艺术家赖以创作和发挥联想的基源。没有城市，就没有浪漫主义。或者说，城市本身产生的故事，就是城市浪漫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城市就是应该与浪漫主义同存，在后钢筋水泥时代，我们便重新这样一个定位，不一定是创新，但肯定是一种新的追忆和回归。在追忆和回归的话语权利下，我们可以就此敞开城市浪漫主义的所有话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呼喊「城市浪漫主义」的重新出场。

## 二、论城市浪漫主义的体现

严格定义什么是「城市浪漫主义」并非容易，因为现在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本身存在极多的争议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当从学术角度提出「城市浪漫主义」时，本来就已经有置身事外的嫌疑，何况又要与钢筋水泥拉开距离，又涉嫌脱离现实的极端主义，但是，当我们无法一下子定义「城市浪漫主义」的内涵时，恰恰在「与钢筋水泥保持距离」这一个原则上是不能让步的，儘管这会引起极大的争议。

<sup>3</sup> 参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远东英汉大词典》、《牛津双解词典》等。

本来，要设想一个完美的城市浪漫主义很简单：如国际都市巴黎的风情，威尼斯水城的荡漾，埃及古文明遗址的缅怀，甚至牛、象横行人行街道的新德里的异趣，南京秦淮河的纸醉金迷，苏杭人间天堂的古今遐想，北京什刹海的唸诗作词，等等，这些城市或则以名胜古蹟闻名，或则以独特地理地貌闻名。但这不一定是「城市浪漫主义」的全部。假如，就北京这个城市，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记忆下的北京传统，绝对是一种实在是最简单的城市的浪漫主义，如贺昌群记忆北京二海（中南海和北海）和中山公园仅仅「泡壶香片，坐在树荫下或水榭上，手持一卷，这样整天的时间便可消消滑过」<sup>4</sup>。或者如蒋梦麟念念不忘的从建筑物体会城市的浪漫，「在北京住过的人，很少人会忘记蔚蓝天空下屋瓦闪闪发光的宫殿和其它公共建筑」，包括「颐和园里有几百年前栽种的古松」<sup>5</sup>。我们现在思考的主要出发点在于，在探讨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保存问题中，人们一般倾向更多地关注实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或其它设施。问题的悲哀在于，在强大的经济（发展）利益驱动下，本来有限的实体性的历史建筑，绝对只能愈益减少，而不可能日益增多。如果仅在这样一个硬体的层面思考都市文化保存，那这条道路将会愈走愈狭。事实上，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保存问题，不能

仅仅是历史文物建筑，而可以指涉更广泛。这不仅是可以扩展都市发展中的文化保存问题研究视域，更重要的是，可以突破由木头乃至钢筋水泥的桎梏，而真正从具文化意义的角度去研究都市的文化保存问题。

城市的浪漫主义问题，所引进的不是原初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那种势如破竹的反传统、反权威、反古典模式的运动，不是同时期中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和表达手法。本文所提出的城市的浪漫主义问题，是相对于城市已经出现并在继续蔓延的生存理性和地理空间限定的人的生活状态及其行为思维，而试图突破并分析与之相对应的从动感性、创意性、自由性、灵悟性等方面展现出的一种极具文化魅力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同文学创造不一样，在城市观察中，古典并不排斥浪漫主义，或者说，现代或后现代中，古典恰恰也是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不能说只是一种对传统或古典的叛逆，或者说，传统或古典也只是相对的，当传统或古典成为一种理性或工具模式体现在城市硬体建设中，它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对现代或后现代的冷漠无情的特徵的补充或点缀。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浪漫主义的出场，才能拯救让城市沦陷于心灵荒漠的境地。浪漫主义恰恰是对城市中心主义的一种解构，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东方中心主义等，它对城市化即理性化或实质上的去感性化，或者直接说出的

<sup>4</sup> 贺昌群《旧京速写》，载《我的旅行记旧》，开明书店，1935年。

<sup>5</sup> 蒋梦麟《迷人的北京》，载《北京的回忆》，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5年，9页。



异化，是一种消解的力量。或者通过艺术行为，或者通过日常活动，或者其它足以形成群体性、模仿性和传播性的文化方式，在城市的所有生活活动中，悄然地立足而无法驱逐它。

在人文北京中，逐步培育或形成上述所说的城市的浪漫主义，在迴避有可能引起极大争议的「兴钢筋水泥保持距离」的话题后，我们至少可以有权说，城市的浪漫主义至少可以消解钢筋水泥引来的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窒息，缓和人们在紧密的城市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衝突。城市的浪漫主义因其畅想性、抒情性、感受性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所以关于城市的浪漫主义的内容，无法作一明确的界定，而取决特定城市群体或观察亲历者的体验和迸发。从目前来看，所有城市的浪漫主义应有的元素，在北京均具备。我们试分析若干方面。

城市的浪漫主义或许有得天独厚的幸运。在自然地理的独特条件下，以人文的薰染，形成各自的浪漫主义。北京的什刹海，南京的秦淮河，一湖一河，本身并不壮观，离开了人，基本与其它湖、河没区别，唯其注入了人文因素，才蕴含或暗涌着浪漫主义，那可能让人脱离世尘烦恼的境界。不过，什刹海弥漫的是唸诗诵词的情调，那种时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与南京秦淮河暗色下人生艰辛而又尴尬的情感暴露，以同样两位名作家写同一「桨声灯影」的思怀和悲恨，那境界决又不相同。此浪漫非彼浪漫，关键在于我们不要把浪漫想得过于

单纯。一般城市均建在依水傍河之地，从巴黎到伦敦，从罗马到埃及，莫不如此。北京即便如什刹海一小片地，能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何况更有极多的历史文化遗址。城市的浪漫主义，不在它的特别建筑，甚或一无所有，即便在一个偏远山区的小镇，那老旧的大车店，仍然会产生许多浪漫主义的故事。关键在人们如何诠释有时空之限的情趣。

城市的浪漫主义也许取决于有激动人心的历史。正如上面所提，浪漫的关键在人们如何诠释有时空之限的情趣。事实上，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几乎都包括了在革命过程中迸发的人的真实情感。巴黎的浪漫不是仅止于情人最佳约会的玫瑰花，可能更在于它的攻打巴士狱的革命精神，乃至同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受中国文革影响的一九六七年红色风暴，让人领略了一种激人血喷的革命浪漫。北京除了什刹海等，还有沙滩的红楼，那是五四运动的记忆所在，甚至景山公园当年崇贞皇帝吊死的地方，人们时而会特意去寻找，这里也潜藏着一种对历史好奇或怀念的浪漫情趣。历史上的革命，包括战争，往往是人性挣扎和情感最充分暴呈的时候，无论是中国，或者前苏联现俄罗斯，那种城市的浪漫主义，可能永远会成为某些城市的情感魅力。作为浪漫主义的厚实基础，对一个社会理想追求，甚至也许某种程度上的乌托邦思想，往往会对城市产生一种品质和风气的独特元素。中国在上世纪长期涌动的革命精神，曾经被许多国家引为浪漫主义的标本。从城市的境况，

看到「中国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sup>6</sup>。保罗·霍兰德曾对上世纪中叶许多人对包括中国城市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进行了观察，其形成的专著，书名《政治朝圣》本身就是某种具有未来主义和乌托邦理想的喻意<sup>7</sup>。

因此，城市的浪漫主义也许取决于乌托邦的理想。撇开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不谈，但作为一个城市，假如没有将理想发挥至极至的对未来的想像和描绘，那么这个城市绝对没有活力，没有未来。城市的浪漫主义或许要允许冒险和遐想的空间。一个不允许冒险和遐想的城市，是谈不上有任何浪漫情趣的。这种所谓冒险，是排除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胡作非为，而是一种敢于对现存社会难以实现的理想进行基本上是不可能失败的冒险试验，或者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发挥对未来的遐想。既然一个曾经有神话的城市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何尝不能让现代人为自己的城市创造新的神话呢？英文单词Romanticism或Romance，本意就除了包含爱情、风流、传奇、多情等意外，还包括作奇想、幻想、虚构故事、空想、想像、甚至夸大和荒谬等。欧洲许多城市之所以被名为浪漫主义城市，史源于启蒙时代之后，人们对于贵族和专制

文化的颠覆，在解构了当下的束缚后，尤其看到城市化后带来的种种罪恶和无所适从，但并无现成的理想社会，于是便出现浪漫主义式的追求，这里不免充满了冒险精神，充满了也许很不现实的遐想、奇想、幻想、虚构故事、空想、想像、甚至夸大和荒谬等等。唐吉珂德绝对不是疯子，而是一种对未来执着不止的浪漫主义理想家。这是当年欧洲城市的浪漫主义一种体现。浪漫主义是人们用最普遍的肢体行为（比如行走）体会城市特点的行为，「任何一次哪怕是在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中的行走，也会成为一次穿越时空、情感、认识的空间之旅，行走于是变得诗意盎然」<sup>8</sup>。

城市的浪漫主义并一定与城市建设的硬件指标成正比。远古的几乎没有变化的某个小城镇，也许就最具有城市的浪漫主义。北京有全世界最高耸的大楼和最豪华的酒店，那里也许有最昂贵的烛光晚餐，但是，2008年奥运前夕，我曾去过已是灯红酒绿的什刹海，总感到那里有后现代过于理性和匠心构筑的感觉，但穿过拥挤的人群，我慢步走进鼓楼后面的胡同，那边已不是火树银花，而是昏暗的路灯，但就在这昏暗的路灯下，胡同的人们悠閒地乘凉，还有的打篮球，当然还有小店为胡同居民服务。与当时整个北京

<sup>6</sup> The Long March, by Simone de Beauvoir, trans by Austryn Wainhouse,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PP484,501。

<sup>7</sup> 见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By Paul Holla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p>8</sup> 练玉春：《城市实践：俯瞰还是行走》，载上海三联书店《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2008年，78页。

繁华景象相比，这里似乎就是另一个世界。然而，在那个时刻，我感到这也是一种城市的浪漫主义。城市的浪漫主义就是可以如此简单而又最令人感动。城市的浪漫主义不一定要大兴土木的，关键是人文和社会情感的培育。

当然，城市浪漫主义不能与当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形成对立和反对的堡垒，那是浪漫主义的极端和恐怖。问题是，城市建设，除了本身在设计 and 规划时，尽可能地融进艺术的浪漫主义元素，同城市的浪漫主义融为一体，同时，在用城市建设所独有的空间权利，为浪漫主义的保存、滋生创造呼吸的空间。巴黎的凡尔赛宫和后来的蓬皮杜中心，北京的鸟巢，悉尼的歌剧院，温哥华的五帆会议中心，等等，都能在本身成为城市浪漫主义一部分外，还能给以后的人有浪漫主义生活境界和遐想空间。这是一个伟大城市应有的聪明和智慧。

### 三、人文北京中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从文学和艺术领域产生的，但也结合了某些社会和政治学的思潮如乌托邦等，这些思潮在城市的浪漫主义中，却恰好地融合在一起，所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精神，包括对历史的批判，对自然的尊重，尤其对古老含有宗教神秘意义的宇宙的尊崇，如中国的天人合一，始终是浪漫主义的表现特徵，而这些特徵，在城市的浪漫主义中全都有表现。这种浪漫主义瀰漫，无异是整个中国掘起时，人们从历史到未来的一次精神消化，从稍微与技术层面的经济保持适当的

距离，人们借此反思了经济发展中的得与失，并且更多地想到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表面上看，一些热衷环保的，甚至追求原生态的，并不现实，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感染甚至影响人们的思维方法，并作出行为能力的适当抉择。

浪漫主义一旦与城市建设结合，成为城市的浪漫主义时，将具有更加众多的表现手法，从传统的叙事手段到现代的影象视觉手法，从文字到图像，从传统表演到行为艺术，这种城市的浪漫主义，最密切进入到市民生活方式中，通过各种媒介手法，强烈地感染和影响社会生活面貌。浪漫主义中的某些元素，以前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今天到处被人们广泛地讨论、争辩、甚至嚐试履行或践行。

浪漫主义在不同时期出现，有时候表现出回覆古老传统的主流，有时则表现出对未来某种理想社会的追求。由于北京奥运闭幕后，北京继续推行人文北京的目标，城市浪漫主义已经成为显学，甚至影响了上海世博的人文感染。一般社会在发生巨大变化时，从表面上，往往会形成某种强大的历史记忆，但对未来展望时，却又表现为浪漫主义，追求过去曾经存在的美好社会，使之成为未来的理想，本来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逻辑轨跡，在城市浪漫主义中表现得尤其如此。

从人文北京看中国，城市建设如何从两个极端摆脱出来，是整个经济掘起中始终面

临的问题。一个极端是，因经济过热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GDP），大量基础设施和住房匆忙上马，缺少总体观念和创意设计，城市建筑出现许多学者批评的千城一面现象，单调，无情，无味，或者仅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钢筋水泥的堆积。另一个极端，是把城市建设作为当代某些后现代艺术的试验，在国外无法进行，而在中国找到了理想的场地，一些怪异的、有违建筑基本原则的作品，在充满争议声中挤进城市建设行列。单调的东西同怪异的东西并列，是绝对创造不出一个城市应有的浪漫主义的。钢筋水泥会窒息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空间，在创意名义下诞生的怪异建筑也许会哗众取宠一时，但怪异作品作为建筑物而长时间停留在人们视线中，很可能会拂乱人心甚至视觉错乱或误导。

因此，本文提出的城市浪漫主义，一方

面关注整体城市建筑的佈局，另一方面更关注在整体城市建筑的佈局背后应具备的城市人文精神。在钢筋水泥的林立中，城市浪漫主义将是调适和平衡后现代时期人们精神健康与社会和谐。北京奥运之后，「人文北京」精神的扩散，继续推动中国城市的浪漫主义掘起。城市文化不再以硬体设施作为唯一标准，而更多地是人们在这个城市中，不但如何展开艺术的想像，而且正在沉思或迸发对历史的记忆和怀念，对遥远未来的想像和对远古原始祖先的回顾。从「人文北京」的角度看，城市浪漫主义，从本质上无论如何必须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它的有时逞现狂奔，有时静默遐想，都是一种对目前状态的理性距离，而又在实际上潜移默化地完善和改良现实中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是城市浪漫主义在本文中提出的要害问题。

## 庆祝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论坛隆重举行

2010年11月6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北京地理学会联合举办的“庆祝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论坛”，在北京联合大学隆重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首都图书馆、北京出版集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北京地理学会、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和其他系所等单位的领导、代表，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关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侯仁之先生的亲属代表齐聚一堂，共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侯仁之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中国‘申遗’第一人”、“活北京”。

论坛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张宝秀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宫辉力教授和首都图书馆陈坚副馆长分别致辞。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郑孝燮先生分别为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题写了贺词，贺词由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先生在会上进行了宣

读。会上播放了侯仁之先生和夫人张玮瑛先生部分近期照片和录像。

在论坛主题发言阶段，侯仁之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唐晓峰教授介绍了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和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集、第三集工作进展情况。侯仁之先生的弟子、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介绍了侯仁之先生与北京学的渊源以及侯先生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贡献。她感谢侯仁之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和对北京学的关心、关怀与指导，并表示北京学研究所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侯先生所题“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为宗旨，学习侯先生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努力为首都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化城市发展服务。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先生则介绍了与侯仁之先生相识、交往的过程和侯仁之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市传统风貌所做的执著努力。

在论坛自由发言阶段，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顾问、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原校长张妙弟教授回忆了自己在北京大学迎新课上所感受到的侯仁之先生授课的精彩与震撼，表达了对侯仁之先生的感恩之情。侯仁之先生的弟子北京市社科院尹均科研究员、北京大学于希贤教

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教授、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处刘波处长、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王均副总经理、首都师范大学王玉蔺讲师以及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刘宗永先生、永定河文化研究会刘德泉副会长分别阐述了侯仁之先生热忱谦逊的人格魅力，注重言传身教的师长风范，严谨求索的学术精神和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并纷纷表示，将秉承和发扬侯仁之先生的学术精神，继续为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做出不懈努力。我国著名文物保护和古建专家、明清史专家、故宫博物原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的女儿单嘉筠女士也在会上重温了侯先生和其父亲单士元先生的友谊。

侯仁之先生之女侯馥兴女士作为亲属代表介绍了侯先生的近况和侯先生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从教以来对各个时代学生的关心与牵念，并向论坛举办方和全体与会者致谢。最后，唐晓峰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而且突出了一个“情”字，今后应更加注意总结、挖掘侯先生的精神财富，学习与传承侯先生高尚的品德。论坛举办单位还向侯先生敬赠了齐白石先生的祝寿图，侯仁之先生的弟子尹钧科研究员代表侯先生各届弟子在祝寿图上题字，侯馥兴女士代侯先生收下了祝寿图。

（本刊通讯员）

## 《鄂尔多斯学研究》增刊月内面世

辑入了“地方学与鄂尔多斯发展”研讨会全部入选论文和多家地方学研究机构简介的《鄂尔多斯学研究》增刊已完成编审程序并送印刷厂发排，预计2010年12月底前可以发行面世。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为展示建会八年来的学术成果，促进全国地方学研究单位的交流互动，为所在地区科学发展活跃理性思维，于今年九月中旬在成吉思汗陵旅游景区举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八周年庆典暨地方与鄂尔多斯发展研讨会”。由于筹备工作较为充分，会前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30余篇。经过认真评价遴选，有24篇论文入围，并分别评定为一等奖（2篇）、二等奖（6篇）和优秀奖（16篇）。这些入围论文大部分在研讨会上做了交流。

研究会还有一项计划，向全国八个地域学团体发出约稿函，拟于会前编印一本“地方学荟萃”。可是由于这些研究单位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处在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时段，

有的出国进行学术活动，截至研讨会召开之前，仅收到泉州学、扬州学和晋学三个兄弟单位的介绍文字，按原计划单独出书，既不全面，又显得单薄。为不食前言，对上述三家研究机构有个交代，研究会将这三篇文章一起收入“增刊”。这样，这期增刊总篇幅已达260页，约22万字。该增刊的“编前话”里说到：“‘地方学荟萃’栏目里的三篇文章，把我们带进了地方学的百花园。读者不难发现，拿我们鄂尔多斯学与其他各级各类地方学相比较，虽然肯定有一些相同、相似的课题与方法，但更多的是特色与个性，正是这些特色、个性，使得地方学这个园圃之中，异彩纷呈，争奇斗艳。我们期待同更多的地方学研究单位开展交流，共同构建这个领域的繁荣与活跃，为各自地方的科学发展、富裕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沈静）

## 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 ——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10月23-25日，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2010年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花园饭店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和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文化官员及内地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共分三个阶段，23日组织境外、京外与会者考察故宫和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24日为全体大会，25日为分组研讨。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和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高级编辑、《文化中国》执行主编张志业先生主持。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冯虹教授，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文化中国》总编梁燕城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官员卡贝丝女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平研究员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大会主题发言精彩纷呈，与会者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多纬度、多特点地探讨了“人文北京与世界城市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议题。

梁燕城教授、张志业主编、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分别作了题为“后后现代的义人城市——寻索一个感通与情际关系的城市文化模式”、“论城市的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人文北京的一种思考”、“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的发言。梁燕城教授指出，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精神的衰败是最严重的城市危机。作为中国最早现代化而又走入后现代的北京，可以有远大胸襟和眼光，建立后后现代以感通、正义与和谐为本的人文城市。张志业主编指出，城市浪漫主义的构建特别要关注整体城市建筑布局背后所具有的人文精神。李国平教授认为构建网络化大都市应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

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北京社科院沈望舒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黎念青副调研员从审视的角度，分别作了题为“世界城市北京——对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建言”、“构建首都城市的‘文明价值’——雒议北京‘世界城’路径与参照系”、“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需要破解的文化难题”的发言。胡兆量教授通过贫富差距、环境问题和交通拥堵等实例的分析，说明北京目



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北京市人口规模膨胀大体上还要维持三十年左右时间，这些问题是新一轮北京城市规划需要认真关注的。沈望舒研究员指出，目前世界城市建设所参考的典范都是硬实力强大的“躯干型”城市，而北京要建设体现东方文明价值的“头脑型”世界城市。黎念青副调研员认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要突出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

张宝秀教授、中科院高晓路研究员、北京物资学院陈喜波副教授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别作了题为“名人故居保护与人文北京建设——国外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经验借鉴”、“基于公众利益的住区管理政策探讨”、“通州运河核心区规划修改建议”的发言。张宝秀教授介绍了国外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经验，并提出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对策。高晓路研究员总结了朝阳区亚奥地区不同类型住区的城市环境管理问题，并提出了建议。陈喜波副教授呼吁拯救运河文化，关注北京郊区发展。

美国WorldLink基金会主席Sharon Crain女士，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张敬淦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顾问、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原校长张妙弟教授从历史文化视角，分别作了题为“从延安到北京——几位中美著名人士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加强地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态度层面——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的发言。Sharon Crain女士主要以新中

国外交部长黄华为例，说明著名人士在中美文化传播与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呼吁保护黄华在京老宅。张敬淦先生指出，城市历史文化要在合理发展中保护，在精心保护下发展。张妙弟教授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强调文化保护和开发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地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态度层面。

此外，台湾辅仁大学袁信爱副教授、加拿大萧祖铭艺术坊萧祖铭总监、加拿大环球教育公司桑宜川总裁、巴黎高等社会科学Sabine Ichikawa教授、日本神户大学徐静波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渡边洋子教授、宁夏大学陈育宁教授以及三峡文化研究会刘开美研究员分别从其它角度作了精彩的发言。

10月25日的分组研讨紧紧围绕人文城市、世界城市两个议题展开，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较为深入的探讨。

闭幕式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所长孟斌副教授和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总裁程婉玲女士共同主持，梁燕城教授和张妙弟教授先后作了大会总结发言。梁燕城教授阐述了城市快速发展对城市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强调城市文化建设要保持单纯、谦卑。张妙弟教授认为，研讨会给北京学的研究工作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北京学研究所将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北京学研究所愿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等兄弟单位加强合作，取得更丰硕的合作研究成果。

(本刊通讯员)

## 2010年安徽省徽学学会学术年会在歙县召开

由安徽省徽学学会主办，黄山市社科联、歙县徽学会承办，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黄山市城建设计院、徽府置业有限公司协办的2010年安徽省徽学学会学术年会11月10-11日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召开。

来自全省各地的徽学专家、学者共90多人参加了学术年会。原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省徽学会会长杜诚，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省徽学会常务副会长马康盛，黄山学院党委书记汪良发，安徽省徽学会副会长张脉贤，黄山市副市长叶长荫，省社科联副主席、省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洪永平等出席会议。黄山市委党校以及歙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开幕式由黄山市社科联主席汪炜主持，杜诚会长讲话，叶长荫副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会议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国权专程看望了与会人员。

今年以来，《徽州文书》、《徽州记忆》、《徽州》、《中国徽州古街》等徽学专著出版发行；新安医学、朱子学、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徽州宗族祠堂等国家与省级社科基金项目正在进行深层次研究；新安大讲堂、徽州大讲堂等普及徽州文化活动不断开

展，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不断涌现，使我省徽学研究在发现、挖掘、整理、研究徽学文献方面，在谋划和实施一些大的徽学科研基础项目、学术工程方面，在徽州文化的普及化方面，在徽学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徽州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的年会主题，从徽州文化的主要内核、徽州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徽学研究的前瞻性问题、如何挖掘和充分利用徽州文化的精髓内容，促进黄山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行了充分研讨。与会代表还考察了歙县正在修复的徽州府衙工程。

（安徽省徽学学会秘书处）

# 庆祝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论坛

2010年11月06日



庆祝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论坛参会人员合影（周新民 摄）



北京学研究所敬赠给侯先生的祝寿图（周新民 摄）



2010年安徽省徽学学会学术年会会场  
(安徽省徽学学会秘书处提供)

